

Does Litigation Experience Improve Audit Partners' Audit Quality?

審計訴訟能改善審計品質嗎？

Wen-Ching Chang,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張文瀾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會計學系

Received 2025/2, Final revision received 2026/1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an audit partner's litigation experience affects subsequent audit quality. Using a sample of financially distressed public firms in Taiwan from 1999 to 2023 and employing the accuracy of the going-concern opinion (GCO) as a proxy for audit quality, this study documents that defendant audit partners remain more likely to issue GCOs to non-bankrupt firms after being sued, suggesting that GCO Type I errors contaminate subsequent audits. However, this contagion phenomenon will be mitigated after the district courts rule in favor of the defendant audit partners.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audit partner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issuing GCOs to soon-to-go-bankrupt firms after being sued, indicating that defendant partners improve audit quality and commit fewer GCO Type II errors, especially those partners whose litigated event clients go bankrupt. Overall, litigation experience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audit partners' GCO Type I errors, but it does significantly reduce GCO Type II errors.

【Keywords】 audit partner, auditor litigation, Type I error, Type II error, going-concern opinion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被告會計師後續是否改善審計品質。以 1999-2023 年臺灣發生財務困難的公開公司為研究樣本，繼續經營疑慮審計意見 (GCO) 的正確性衡量審計品質，本文實證結果顯示被告會計師後續仍持續對未破產公司出具 GCO，代表 GCO 型一錯誤繼續蔓延至後續審計，惟此種蔓延現象在一審法院判決被告會計師勝訴後減緩。另一方面，本文亦發現被告會計師後續對即將破產公司出具 GCO 的可能性顯著增加，顯示被告會計師改善審計品質且較不會犯 GCO 型二錯誤，尤其是那些訴訟事件客戶破產的被告會計師。整體而言，會計師的 GCO 型一錯誤並不因審計訴訟而改變。相對地，GCO 型二錯誤會因審計訴訟而顯著降低。

【關鍵字】 合夥會計師、審計訴訟、型一錯誤、型二錯誤、繼續經營疑慮審計意見

壹、緒論

會計師簽證是財務報告公信力之基石，攸關資本市場之健全發展。促使審計人員提供高品質審計的誘因包括保護聲譽、避免訴訟以及監督機制 (DeFond, 2010)。就訴訟機制而言，除了防範嚇阻，對於查核過失的當事人亦應具警惕或學習效果，然而這部分卻少有文獻探討。本文針對審計訴訟，旨在探討被告會計師後續是否改善審計品質，以提供審計訴訟對當事人影響之證據並補足文獻缺口。

關於審計人員經歷審計失敗或法律訴訟後的行為轉變，既有文獻存在三種理論假說。Lennox and Li (2014) 發現審計人員會從審計失敗的經驗中學習，因而改善後續審計品質，本文稱之為學習假說。Schmidt (2009) 主張訴訟經驗將誘使審計人員在後續的審計案件中從事更保守的行為以避免未來的訴訟，本文稱之為保守假說。最後，另有文獻發現，在某一年中經歷審計失敗的審計人員在隨後數年中發生審計失敗的可能性更高 (Francis and Michas, 2013; Knechel, Vanstraelen, and Zerni, 2015; Li, Qi, Tian, and Zhang, 2017)，本文稱之為蔓延假說。此蔓延假說隱含發生審計失敗的當事人繼續維持低品質審計，並未改善審計品質。

Anantharaman, Pittman, and Wans (2016) 發現訴訟風險愈高，審計人員愈可能對財務困難客戶出具繼續經營疑慮審計意見 (Going-concern Opinion，以下簡稱 GCO)。但其證據無法釐清審計人員究係以提高審計品質，或增加審計保守性以因應訴訟風險。為有效釐清上述三個理論假說何者具主宰效果，本文不觀察 GCO 變化，而是觀察 GCO 錯誤變化。Geiger and Rama (2006) 指出，高品質審計人員較能辨識何時需修改或不修改其客戶繼續經營困難的審計意見。這種較高的 GCO 正確性將降低 GCO 錯誤率。因此，較低的 GCO 錯誤可做為較高審計品質的衡量指標 (Geiger and Rama, 2006; Knechel and Vanstraelen, 2007)。GCO 錯誤可分為二類。一是公司破產前，未收到 GCO，此稱為 GCO 型二錯誤。另一是未破產公司收到 GCO，此稱為 GCO 型一錯誤。

綜言之，若審計訴訟事件能發揮警惕效果，讓會計師從錯誤中學習，未來將較能正確評估客戶的繼續經營能力，學習假說預期被告會計師未來的 GCO 型一或型二錯誤下降。若審計訴訟事件係誘使會計師從事更保守的行為以避免未來的訴訟，保守假說預期被告會計師未來會增加出具 GCO，導致 GCO 型二錯誤下降，但 GCO 型一錯誤上升。最後，若發生審計訴訟的會計師繼續維持低品質審計，蔓延假說預期被告會計師後續仍持續或增加 GCO 型一或型二錯誤。

本文以 1999-2023 年臺灣公開公司為研究樣本。在臺灣，法規一方面要求會計師須於查核報告上簽名，從而承擔專業與法律責任；另一方面規範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以下簡稱投保中心）係唯一得代表投資人提起團體訴訟之機構。

在此制度特性下，本文可搜集到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個人以及證券團體訴訟之相關資料。實證結果發現，被告會計師在被起訴前與後，皆較未被告會計師更可能對未破產公司出具 GCO，且此 GCO 型一錯誤的可能性在審計訴訟前後之間並未有顯著差異，顯見被告會計師仍呈現持續犯 GCO 型一錯誤的現象；惟此種 GCO 型一錯誤的持續現象，在一審法院判決被告會計師勝訴後減緩。在 GCO 型二錯誤方面，本文發現，在起訴前，被告會計師與未被告會計師對即將破產公司出具 GCO 的可能，並無顯著差異；但在經歷審計訴訟後，則是被告會計師較未被告會計師更可能對即將破產公司出具 GCO，且此 GCO 型二錯誤可能性的下降，已達統計顯著差異，顯示審計訴訟顯著降低會計師犯 GCO 型二錯誤的可能。在訴訟特性的分析上，GCO 型二錯誤的改善主要是突顯在曾經歷訴訟事件客戶 (Litigated Event Clients) 破產的被告會計師。

除了被告會計師「個人」外，本文也分析被告會計師「事務所」的 GCO 正確性變化。實證結果發現被告會計師犯型一錯誤的現象，僅限於其自身，並未蔓延至整個會計師事務所。然而，審計訴訟帶來的學習效果，卻並不僅侷限於被告會計師本人，其任職的事務所藉由訴訟事件客戶的查核過失，改善品質管制制度，顯著降低整體事務所的 GCO 型二錯誤。整體而言，蔓延假說的證據存在於犯 GCO 型一錯誤的會計師，學習假說的證據則存在於犯 GCO 型二錯誤的會計師及其任職的會計師事務所。

在審計學術研究上，本文具有下述數項貢獻。第一，Anantharaman et al. (2016) 與 Chy, Franco, and Su (2021) 呼籲未來研究應多探討法律環境與審計人員行為兩者間關係，本文證據回應其呼籲。第二，避免訴訟是審計人員維繫審計品質的重要誘因 (Khurana and Raman, 2004)；但訴訟制度是否能警惕行為過失人改善其審計品質，卻少有實證證據；本文提供避免訴訟理論的實證證據。第三，美國係以會計師事務所負法律責任，目前的審計訴訟文獻僅提供會計師事務所或分所層次的證據 (Lennox and Li, 2014; Schmidt, 2009)。相對地，依臺灣會計師法，係由查核報告上簽名的會計師承擔法律責任；因此本研究結果將證據延伸至合夥會計師 (Audit Partner) 層次。第四，在審計訴訟與 GCO 的研究上，Anantharaman et al. (2016) 僅觀察 GCO，無法釐清審計人員是以提高審計品質或是增加審計保守性以因應訴訟風險。本研究利用客戶破產與否，能客觀辨認審計人員犯 GCO 型一與型二錯誤之情境，從而較能釐清學習假說與保守假說，究竟何者成立；本文證據並不支持保守假說。第五，在探討會計師個人審計失敗影響的文獻中，前人文獻探討的個人審計失敗事件計有財報重編 (Li et al., 2017)、GCO 錯誤 (Knechel et al., 2015)、與懲戒 (洪玉舜與顏信輝, 2011; Chang, Chen, Chou, and Ko, 2016)，本文則將個人審計失敗定義為審計訴訟，增添會計師個人審計失敗影響的文獻。最後，審計工作是由查核團隊執行，DeFond

and Francis (2005)、Francis (2011) 與 DeFond and Zhang (2014) 皆呼籲未來研究多多提供會計師個人層次之證據。本文提供審計訴訟是否影響會計師個人審計品質的證據，正是回應他們的呼籲。

另外，過去臺灣對於公司管理當局與會計師興訟風氣並不盛，前人文獻（如洪玉舜與顏信輝，2011；Chang et al., 2016）多以懲戒作為審計失敗的替代變數，觀察被懲戒會計師簽證行為之轉變。因此，除了審計失敗事件本質（訴訟 vs. 懲戒）不同外，本文與前引二篇文獻存有下列不同。首先是觀察的簽證行為不同，洪玉舜與顏信輝 (2011) 是觀察裁量性應計數，Chang et al. (2016) 是財報重編，而本文則是 GCO 錯誤。其次是觀察期的長度，洪玉舜與顏信輝 (2011) 僅觀察懲戒前後二期，屬於短期的觀察期，本文則是長期的觀察期，從而發現一審判決被告會計師勝訴後，GCO 型一錯誤的蔓延現象減緩，以及 GCO 型二錯誤的改善並非短期現象。最後是研究期間不同。上述二篇文獻是以 2000-2007 年或 2000-2006 年為研究期間，落在 2007 年年底會計師法修正案通過之前；2007 年的修法加重會計師的法律責任，會計師面臨的法律環境不同以往，本文將研究期間延伸至 2023 年，共計 25 年，較能完整納入會計師面臨的法律環境。

在政策與實務意涵上，讓會計師承擔財報簽證不實的法律責任，對會計師而言是一種警惕，對投資大眾而言則是一種保障。因此審計訴訟能否有效提高審計品質，對受查客戶、投資大眾、主管機關，乃至會計師皆為重要之資訊。本文研究結果顯示審計訴訟的確會對會計師之簽證行為產生警惕作用。投資人與企業欲評估會計師的審計品質，除了蒐集個人特徵的資料外，亦應蒐集其是否曾為被告的資訊，以綜合評估未來審計品質變化。在會計師監理上，本文並未發現被告會計師全面提升審計品質，主管機關宜就曾被被告的會計師，加強對其簽證案件之實質審查，及對其任職會計師事務所之品質管制檢查業務。最後，本文證據亦可供審計實務界參考：審計訴訟對 GCO 正確性的提升，並非一次到位，審計專業仍需繼續努力降低 GCO 型一錯誤，以免削弱 GCO 預警公司繼續經營困難之功能。

本文後續內容架構如下：第二節為制度背景、文獻回顧以及假說發展，第三節說明資料來源與樣本，第四節介紹實證設計與結果，第五節為額外分析，最後第六節提出結論。

貳、制度背景、文獻回顧與假說發展

一、制度背景

在臺灣，會計師法主要以會計師個人為管理對象，要求會計師須於查核報告上簽名，並以此承擔專業與法律責任。隨著臺灣證券市場的發展，為了強化會計師互

相監督之力量，以及對投資人提供較高損害賠償，自 1983 年起，公開發行、上市、櫃公司之財務報表須經由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二位會計師查核簽證，此即所謂「雙簽制度」。

不過，會計師法過去並未規範會計師事務所的責任與義務，亦未明訂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屬於合夥關係。為強化對會計師的監理，2007 年 12 月 7 日修訂的會計師法，除明定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為合夥組織，亦規定金管會得派員檢查經核准且辦理公開發行公司簽證業務之會計師事務所之業務及其與業務相關之財務狀況，對於經檢查發現重大缺失或違規事項之會計師事務所，金管會得廢止該事務所簽證公開發行公司之核准¹。

在會計師訴訟案件上，自 1962 年臺灣建立證券市場始，至 1997 年止，僅有一件控訴會計師的案例。1998 年，臺灣爆發數起地雷股，引爆本土型金融風暴。為妥善保護投資人權益，1998 年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設置投資人服務與保護中心（以下簡稱投服中心），代理投資人向法院提起集體訴訟。2002 年 7 月頒布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以下簡稱投保法），並於 2003 年 1 月 1 日施行，投保中心則於 2003 年 1 月依投保法規定成立，接續原投服務中心之業務。

實務上，證券團體訴訟幾乎均由投保中心承攬。目前投保中心所辦理的團體訴訟求償案件，主要為財務報告不實（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0 條及第 20 條之 1）、公開說明書不實（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2 條）、操縱股價（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155 條）及內線交易（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之 1）等四種類型。截至 2024 年 8 月，投保中心網站的彙整資料顯示，受理中的案件共 77 件訴訟案件²，其中涉及財務報表或公開說明書不實者 54 件，會計師及事務所列為被告者，共有 47 件。結案的案件計有 169 件，其中涉及財務報表或公開說明書不實者 40 件，會計師及事務所列為被告者，共有 31 件。

投保中心的實務處理流程大略如下（林俊宏，2014）：（一）不法情事爆發後，投保中心會留意案件後續發展及檢調單位調查情形，並指定專人處理投資人之諮詢及申訴。（二）投保中心接獲刑事起訴書、判決書或關於違法情節的具體事證資料後，將分析案件事實，評估得否受理受害投資人求償登記、受理條件及其法律依據。（三）若完成授權登記程序之投資人達 20 人以上，投保中心即會依投保法第 28 條規定，以自己之名義提起團體訴訟，相關訴訟及執行程序均由投保中心辦理。因投

1 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核准準則第 10 條。

2 有部分案件，因被告已與投保中心達成和解，其案例已經由投保中心網站上移除。<https://www.sfpic.org.tw/News.aspx?n=7505&sms=12304>

保中心辦理團體訴訟案件具有強烈公益性，案件如獲賠償，在扣除訴訟程序支出之裁判費、郵電費等必要費用後，款項即全數分配給有辦理授權登記的投資人，投保中心不會請求任何報酬，以充分維護投資人獲償的權益。

二、文獻回顧

(一) GCO 正確性文獻回顧

前人研究曾探討審計人員特性對 GCO 正確性的影響。Geiger and Rama (2006) 發現 Big N 審計人員的 GCO 正確性高於非 Big N。至於查核任期（如 Geiger and Raghunandan, 2002; Knechel and Vanstraelen, 2007）以及非審計公費（如 Callaghan, Parkash, and Singhal, 2009; Robinson, 2008）對 GCO 正確性的影響，並未獲致顯著證據。以會計師事務所的分所為衡量基礎，Ahn and Jensen (2018) 發現審計人員過去犯 GCO 型一錯誤的變動與後續犯 GCO 型一錯誤的變動成負相關，而 GCO 型二錯誤亦存在此負相關。他們的證據顯示審計人員會根據過去 GCO 的錯誤據以調整後續保守立場。

有些研究則是探討客戶特性對 GCO 正確性的影響。Berglund, Herrmann, and Lawson (2018) 發現管理者能力可降低審計人員犯型一錯誤的風險，卻增加型二錯誤的風險。Zhang (2018) 則發現會計可比較性與 GCO 正確性呈正相關。Chung, Sonu, Zang, and Choi (2019) 發現事前成功避免 GCO 的公司，審計人員事後較可能犯 GCO 型二錯誤。

也有研究是觀察 GCO 正確性的變化趨勢。Geiger and Raghunandan (2001) 發現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 (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 PSLRA) 降低審計人員的訴訟風險，因而 GCO 型二錯誤上升。Geiger, Raghunandan, and Rama (2005) 發現沙氏法案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的通過加重審計人員的責任，GCO 型二錯誤大幅下降。然而此型二錯誤的下降並不持久，隨著時間的經過又逐漸上升，回到沙氏法案前的水準 (Feldmann and Read, 2010)。Sanoran (2018) 觀察金融風暴前後的 GCO 正確性的變化，並發現風暴期間 (2007-2008) 的型一錯誤顯著低於風暴之前 (2005-2006)，而型二錯誤則無顯著變化。上述研究皆是以美國公司為樣本。Carcello, Vanstraelen, and Willenborg (2009) 則以 2001-2002 的比利時未公開公司為樣本，發現採用以規則為基礎的審計準則使得審計人員變得更保守（型二錯誤降低、型一錯誤增加）。Carey, Kortum, and Moroney (2012) 利用澳洲公開公司的資料發現沙氏法案前 (1995-1996)、後 (2004-2005) 的型一錯誤並無顯著變化。

相較於上述研究皆以會計師事務所或分所為基礎，迄今僅少數研究以合夥會計師為主體，探討 GCO 正確性。Knechel et al. (2015) 係以瑞典未公開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發現合夥會計師的 GCO 錯誤具有持續性，亦即犯型一錯誤的會計師未來

仍較可能繼續犯型一錯誤，而犯型二錯誤的會計師未來仍較可能繼續犯型二錯誤。Hardies, Vandenhoute, and Breesch (2018) 以比利時的未公開公司為樣本，發現文獻上常見的高審計品質代理變數（如 Big N、產業專家、查核經驗以及性別）並未在未公開公司有較低的型二錯誤。據本文所知，以合夥會計師為基礎的 GCO 正確性證據迄今僅存於未公開市場，尚未見公開審計市場的證據。

（二）審計訴訟與審計品質影響文獻回顧

所謂「避免訴訟誘因」是指訴訟可能會導致審計人員承受重大財務損失（不論是庭外和解或敗訴時支付損害賠償）以及聲譽資本的減損，為了避免訴訟，審計人員有誘因提供高品質審計 (Dye, 1993; Chy et al., 2021)。

過去的實證研究多是探討訴訟風險／法律責任與審計品質的關聯性。有研究是以各國法律環境的不同來衡量訴訟風險，並發現國家層級的訴訟風險愈高，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四大）客戶的（事前）權益資金成本較低 (Khurana and Raman, 2004) 以及四大客戶的盈餘品質較高 (Francis and Wang, 2008)。這二個證據皆支持訴訟風險與審計品質呈正相關，但 Choi, Kim, Liu, and Simunic (2008) 的審計公費證據則並不支持。也有研究不以國家別衡量訴訟風險，而改以客戶層級衡量訴訟風險。利用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rthur Andersen，以下簡稱 Andersen）解體、原 Andersen 客戶被迫更換審計人員之事件，Cahan and Zhang (2006) 實證發現前 Andersen 客戶在 2002 年的裁量性應計數較四大其他客戶為低，且減少的幅度較四大其他客戶為高，顯示繼任審計人員會將 Andersen 查核視為訴訟風險，因而驅動保守行為。利用客戶財務資料估計審計人員被告的可能性，前人研究發現訴訟風險愈高，審計人員愈抑制客戶的盈餘管理行為 (Boone, Khurana, and Raman, 2011; Sun and Liu, 2011) 愈可能及時出具否定意見的內控查核報告 (Chen and Chen, 2024)，或是增加關鍵查核事項內容的詳細度（何里仁與李雅涵，2024）。

其次，有研究探討審計人員法律責任條文之制定或修正對審計品質的影響。如 1995 年 PSLRA 將審計人員的法律責任改為比例責任制，降低審計人員所面臨之賠償責任，有研究發現在該法案設立後，審計人員較不可能對即將破產客戶出具 GCO (Geiger and Raghunandan, 2001)，較不抑制客戶的裁量性應計數 (Lee and Mande, 2003)，降低資訊不對稱與條件保守主義的關聯性 (Liu and Elayan, 2015)。此外，沙氏法案的通過加重審計人員的責任，審計人員較可能對即將破產客戶出具 GCO (Geiger et al., 2005)。審計人員在 1933 證券法所承擔的法律責任高於 1934 證券交易法，Venkataraman, Weber, and Willenborg (2008) 發現 IPO 前（適用 1933 證券法）的異常應計數較 IPO 後（適用 1934 證券交易法）為少且多為負向。前述這些證據皆支持法律責任愈高，審計品質愈高。

另有研究利用會計師事務所的組織型態從無限責任合夥（General Partnership，以下簡稱 GP）轉變為有限責任合夥（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以下簡稱 LLP）的情境，探討此轉變對審計品質的影響。Muzatko, Johnstone, Mayhew, and Rittenberg (2004) 提供美國的證據顯示 LLP 事務所的客戶有較高的 IPO 折價，支持審計人員的法律責任降低，投資人認知的審計品質降低。然而不論是來自英國的證據 (Lennox and Li, 2012) 或是日本的證據 (Chi and Pan, 2021)，皆未發現 LLP 顯著影響審計品質（衡量指標為異常應計數與修正式審計意見）。相反地，Firth, Mo, and Wong (2012) 利用中國的資料，發現改採有限責任公司型態的審計人員較不可能出具修正式審計意見。Firth et al. (2012) 的證據支持法律責任曝險的威脅會影響審計人員查核報告的保守性。

也有研究利用習慣法下美國各州對第三人法律責任體制的不同衡量審計人員的訴訟風險，並發現州別層級的訴訟風險愈高，審計人員要求財務困難的產險客戶認列較高的損失準備金 (Gaver, Paterson, and Pacini, 2012)，增加對財務困難客戶出具 GCO 的可能性 (Anantharaman et al., 2016)，降低客戶發生財報重編的可能性 (Al-Hadi, Taylor, Hasan, and Eulaiwi, 2023) 以及抑制客戶從事避稅行為 (Owusu and Lin, 2025)。Chy et al. (2021) 不採前述的水準研究 (Level Study)，而是利用各州習慣法下法律責任體制的改變衡量訴訟風險的變動，提供證據顯示審計人員所處的州別法律責任增加，客戶獲得銀行貸款的可能性增加，以及取得貸款的平均金額也增加，故依然支持訴訟風險提升審計品質論。不同於前述文獻以州別層級衡量訴訟風險，Li, Qi, and Zhang (2024) 改以聯邦法官的意識形態衡量訴訟風險，其結果發現客戶所屬地區的自由派法官愈多，審計人員的訴訟風險愈高（較可能被告以及賠償金額較大），因而愈可能對這些客戶出具 GCO，收取較高審計公費，但財報品質則不受影響。

相較之下，探討實際發生的審計訴訟對後續審計品質影響的文獻甚少。Schmidt (2009) 發現被告的事務所分所其後續客戶報導調增盈餘的異常應計數幅度（查核報告日數）顯著降低（增加）。Lennox and Li (2014) 發現事務所被告後，其客戶後續發生財報誤述的可能性顯著降低。在事務所分所層面，相對於被告事務所中的未被告分所而言，Lennox and Li (2014) 發現被告分所的過去訴訟經驗和未來財報誤述之間的負面關聯更為強烈。

綜上所述，美國係以會計師事務所負法律責任，目前的審計訴訟文獻僅提供會計師事務所或分所層次的證據 (Lennox and Li, 2014; Schmidt, 2009)。在臺灣，會計師法係以查核報告上簽名的會計師承擔法律責任，卻尚未有研究探討會計師被告之後，其後續審計品質變化，本文試圖填補此一文獻之缺口。

三、研究假說

審計的本質是一個判斷和決策過程。由於風險承受能力、誠信和過度自信等

個人屬性，會計師可能會表現出不同的報告風格 (Knechel et al., 2015)。此外，會計師事務所的品質管制制度若有瑕疵，亦可能使該事務所的審計品質存在系統性的問題。發生單一審計失敗案件後，若審計人員認知此屬偶發個案，並不代表其整體審計品質，預期審計人員將持續自己的風格，不會改善後續的審計品質。此稱為蔓延假說。前人研究已提供證據顯示發生審計失敗的審計人員對同一年內或是後續年度的其他審計委任案件皆提供較低品質的審計 (Francis and Michas, 2013; Knechel et al., 2015; Li et al., 2017)。在本文情境，根據蔓延假說，發生審計訴訟的會計師繼續維持低品質審計，預期被告會計師後續 GCO 型一或型二錯誤不會減少（有可能不變或增加）。

學習假說則主張，審計失敗的經驗會向審計人員發出新訊息，使他們的信念產生變化，從而影響後續的行動 (Lennox and Li, 2014)。例如，審計失敗發生後，會計師事務所可能重新檢視並下調對所內人員專業能力與誠信的評分，或認為現行品質管制流程的可靠度不足。其後，會計師事務所採取因應措施，給予人員更多培訓，或引入優質的品質管制程序，因而改善審計品質。若審計人員從單一審計失敗案件認知自己的審計品質存在系統性問題，預期審計人員將改善後續的審計品質，以避免未來再被告。前人的證據顯示發生審計失敗的審計人員後續改善審計品質 (Chang et al., 2016; Lennox and Li, 2014)。在本文情境，根據學習假說，發生審計訴訟的會計師從錯誤中學習，從而改善審計品質，將更能正確評估客戶的繼續經營能力，預期被告會計師未來的 GCO 型一或型二錯誤下降。

最後，較高的訴訟風險亦可能增加審計人員的保守主義 (Thoman, 1996; DeFond and Subramanyam, 1998; Francis and Krishnan, 1999)。前人文獻指出會計不法涉及權益高估時，審計人員較可能被告 (Lennox and Li, 2020)，或是出具 GCO 能減低賠償的金額 (Carcello and Palmrose, 1994; Kaplan and Williams, 2013)。這些證據指出保守主義可限制訴訟風險。Kadous (2000) 發現單是高品質審計尚不足以阻止審計人員在企業失敗案例中被告，因此保守假說預期被告的審計人員可能採取更保守的行為以降低未來再被告的可能，或是降低被告後的賠償金額。Schmidt (2009) 的證據顯示被告的審計人員後續較嚴格限制客戶從事調增淨利的盈餘管理行為。在本文情境，根據保守假說，審計訴訟事件誘使會計師在後續的審計案件中從事更保守的行為以避免未來的訴訟，因而將增加 GCO 的出具，並預期被告會計師未來的 GCO 型二錯誤下降，但 GCO 型一錯誤上升 (Geiger and Rama, 2006)。

綜上所述，三種理論假說與 GCO 錯誤變化的對應關係，詳如表 1。此外，這三種理論假說之間無須是相互排斥的關係，有可能是同時存在的關係。由於實證研究僅能偵測主宰因素的效果 (Liu and Elayan, 2015)，而上述三個理論假說何者具有主宰效果，實屬實證問題，故本文不事先設定假說預期。根據表 1，本文發展五個

競爭性對立假說如下：

假說 a（保守假說）：被告會計師後續犯下 GCO 型一錯誤之機率顯著上升，然其型二錯誤之機率則顯著下降。

假說 b（全面學習假說）：被告會計師後續犯下 GCO 型一與型二錯誤之機率均顯著下降。

假說 c（全面蔓延假說）：被告會計師後續犯下 GCO 型一與型二錯誤之機率顯著上升或維持不變。

假說 d（部分蔓延與部分學習假說）：被告會計師後續犯下 GCO 型一錯誤之機率維持不變，然其型二錯誤之機率則顯著下降。

假說 e（部分學習與部分蔓延假說）：被告會計師後續犯下 GCO 型一錯誤之機率顯著下降，然其型二錯誤之機率則顯著上升或維持不變。

表 1 三種理論假說與 GCO 錯誤變化的對應關係

		GCO 型一錯誤		
		上升	不變	下降
GCO 型二 錯誤	上升	（假說 c） 二種錯誤都是蔓延假說	（假說 c） 二種錯誤都是蔓延假說	（假說 e） 型一錯誤學習假說 型二錯誤蔓延假說
	不變	（假說 c） 二種錯誤都是蔓延假說	（假說 c） 二種錯誤都是蔓延假說	（假說 e） 型一錯誤學習假說 型二錯誤蔓延假說
	下降	（假說 a） 保守假說	（假說 d） 型一錯誤蔓延假說 型二錯誤學習假說	（假說 b） 二種錯誤都是學習假說

參、資料來源與樣本

被告會計師的姓名、系爭財務報告的年度以及一審法院之判決結果與日期，係由人工詳讀判決書加以辨認。破產公司的資料來源包括臺灣經濟新報社 (TEJ) 危機事件資料庫，手工搜尋公司全額交割、下市、與撤銷公開發行之原因，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訊息查詢，以及司法院裁判書系統查詢等共 7 個來源。其餘本研究需要之實證資料均取自 TEJ。

集體訴訟始自 1998 年，而本文目的旨在觀察會計師被告後的 GCO 正確性的改變，因此以 1999 至 2023 年為研究年度³。研究範圍包含金管會管轄的公司，因為這些公司不論上市、櫃與否，皆被要求公開財務等相關資料。樣本篩選條件包括刪除發行臺灣存託憑證的外國公司以及資料缺漏的觀察值。被起訴的事件公司已經證實是低審計品質，為避免研究結果偏誤，乃予以刪除⁴。此外，有 2 個事件公司因尚未判決而無判決書，導致無法辨認被告會計師為何人，這部分共涉及 8 位會計師，因而刪除這 8 位會計師查核的觀察值，共計 1,074 筆。再者，會計師不會對財務健全公司出具 GCO，乃再刪除無財務困難指標的公司。所謂財務困難是指營業活動現金流量為負、本期虧損、運用資金短絀、或是保留盈餘為負值，符合任一指標者 (DeFond, Raghunandan, and Subramanyam, 2002; Geiger and Raghunandan, 2002; Carcello et al., 2009)⁵。最後，本文亦刪除本期已經破產的公司。公司宣告破產後，並非立即清算結束，在破產狀態下仍有可能存續數年，而會計師往往對它們出具 GCO (Carcello and Neal, 2000)。所謂破產公司是指公司聲請解散、破產、重整、或是金融機構被主管機關接管等。本期及下期皆未破產（以下簡稱未破產）公司最終的樣本量為 27,888（4,363 家公司，1,033 位會計師），而本期末破產但下期破產（以下簡稱破產）公司的樣本量則是 233（205 家公司，168 位會計師）⁶。樣本篩選結果列於表 2。

表 3 列示本文樣本分佈情形，第一部分為樣本年度分布，其中第 (1)-(3) 欄為未破產公司，而第 (4)-(6) 欄為破產公司。在第 (2) 欄，可以看出在樣本期間內，會計師對未破產公司出具 GCO 的觀察值並無明顯的趨勢現象，整體的平均型一錯誤率約為 3% (= 780 / 27,888)。在第 (6) 欄，可以看出在亞洲經濟危機期間（1999-2000 年）破產公司家數較多，但這 2 年出具 GCO 的觀察值卻未達半數⁷。整體的平均型二錯誤率約為 57% (= 132 / 233)。第二部分是產業分布情形。在未破產樣本，建材營造

3 因需辨認公司下期是否破產，資料蒐集期間則是截至 2024.12.31。

4 若是不刪除，破產樣本會增加到 261，未破產樣本則是 28,837，後續實證結果並無重大改變。

5 DeFond et al. (2002) 係以營業活動現金流量為負或本期虧損定義財務困難公司，改用他們的定義，破產樣本會減少到 223。若是將財務困難公司限定在運用資金短絀或是保留盈餘為負值者，破產樣本會減少到 202。若是不限定財務困難公司，破產樣本會增加到 244。後續 GCO 型二錯誤的實證結果皆無重大改變。GCO 型一錯誤的結果亦不受財務困難定義的影響。

6 刪除的是本期 (t 期) 已宣告破產的公司 (因 GCO 幾乎必然，無法檢驗判斷品質)，而保留的「本期末破產但下期破產公司」係指 t 期後一年 ($t+1$) 宣告破產者，用以衡量 GCO 型二錯誤，屬研究設計所必須保留之觀測值。

7 為避免本研究結果是由亞洲經濟危機期間獨有，刪除 1999 與 2000 年此二年度後，重新執行相關實證分析，實證結果並未有重大改變。

表 2 樣本選取

	公司_年觀察值
1999-2023 年公開發行公司	64,193
減：臺灣存託憑證公司	(299)
資料不全者	(3,944)
事件公司	(1,478)
無判決書	(1,074)
非財務困難公司	(28,877)
已經破產的公司	(400)
最終樣本	28,121
本期未破產且下期未破產公司	27,888
本期未破產但下期破產公司	233

表 3 樣本分布

第一部分：年度分布

年度	未破產樣本			破產樣本		
	(1) GCO = 0	(2) GCO = 1	(3) 合計	(4) GCO = 0	(5) GCO = 1	(6) 合計
1999	1,772	55	1,827	25	12	37
2000	1,681	66	1,747	36	11	47
2001	1,487	64	1,551	8	6	14
2002	1,329	47	1,376	5	5	10
2003	1,207	35	1,242	11	8	19
2004	1,061	38	1,099	4	10	14
2005	956	35	991	8	13	21
2006	857	49	906	3	6	9
2007	819	36	855	6	5	11
2008	948	37	985	2	1	3
2009	998	36	1,034	1	2	3
2010	1,007	31	1,038	0	1	1
2011	1,006	28	1,034	6	1	7
2012	1,068	21	1,089	3	3	6
2013	1,059	15	1,074	2	6	8
2014	1,055	15	1,070	5	3	8
2015	1,040	18	1,058	1	0	1
2016	1,029	20	1,049	1	1	2
2017	1,119	23	1,142	1	2	3
2018	1,069	18	1,087	2	2	4
2019	973	21	994	1	0	1
2020	865	23	888	1	0	1
2021	952	20	972	0	0	0
2022	830	16	846	0	1	1
2023	921	13	934	0	2	2
合計	27,108	780	27,888	132	101	233

第二部分：產業分布

產業	未破產樣本			破產樣本		
	(1) GCO = 0	(2) GCO = 1	(3) 合計	(4) GCO = 0	(5) GCO = 1	(6) 合計
水泥與玻璃陶瓷業	239	20	259	2	1	3
食品工業	394	14	408	3	6	9
塑膠與化學工業	858	18	876	2	6	8
紡織纖維業	983	54	1,037	3	12	15
電機機械業	1,192	23	1,215	3	2	5
鋼鐵工業	861	37	898	6	3	9
建材營造業	1,463	92	1,555	9	12	21
觀光業	547	27	574	5	3	8
金融業	2,868	73	2,941	21	9	30
貿易百貨業	458	15	473	4	2	6
生技醫療業	2,059	49	2,108	2	3	5
半導體業	1,888	49	1,937	8	2	10
電腦及週邊設備業	1,424	28	1,452	8	11	19
光電業	2,932	77	3,009	18	18	36
通信網路業	1,484	32	1,516	14	3	17
電子零組件業	2,052	19	2,071	3	0	3
資訊服務與通路業	1,787	28	1,815	9	1	10
其他電子業	634	18	652	2	1	3
其他	2,985	107	3,092	10	6	16
合計	27,108	780	27,888	132	101	233

業收到較多的 GCO，型一錯誤率為 6% (= 92 / 1,555)，高於 3% 的平均數。在破產樣本，幾乎所有的產業皆有收到 GCO，件數較多的產業為光電、紡織纖維和建材營造業。

肆、實證模式與變數衡量

一、實證模式

本文實證模式建構如下：

$$GCO = \beta_0 + \beta_1 BEFORE + \beta_2 AFTER + Controls + v \dots, \quad (1)$$

其中

$GCO = 1$ ，公司本期收到 GCO，否則為 0。

$BEFORE = 1$ ，會計師被投保中心起訴之前的受查客戶，否則為 0。

$AFTER = 1$ ，會計師被投保中心起訴之後的受查客戶，否則為 0。

$Controls$ = 控制變數向量。

在未破產樣本執行模式 (1)，意在取得 GCO 型一錯誤的證據。前人文獻指出一個審計失敗事件，往往可系統性反映該名審計人員的整體審計品質水準較低 (Chang et al., 2016; Francis and Michas, 2013; Li et al., 2017)。預期 *BEFORE* 的係數符號在未破產樣本中為正向，代表被告會計師在起訴前相較於未被告的會計師，較可能犯型一錯誤。類似地，在破產樣本執行模式 (1)，則是在取得 GCO 型二錯誤的證據。預期 *BEFORE* 的係數符號在破產樣本中為負向，代表被告會計師在起訴前相較於未被告的會計師，較可能犯 GCO 型二錯誤。

保守假說預期 GCO 型一錯誤顯著增加，但 GCO 型二錯誤顯著下降，當 *AFTER* 的係數不論在未破產或破產樣本中皆顯著大於 *BEFORE* 的係數，代表假說 a 得到支持。其次，若是 *AFTER* 的係數在未破產樣本顯著小於 *BEFORE* 的係數，而破產樣本則是顯著大於 *BEFORE* 的係數，代表 GCO 型一與型二錯誤皆顯著下降，支持假說 b。再者，若是 *AFTER* 的係數在未破產樣本顯著大於或是未異於 *BEFORE* 的係數，而破產樣本則是顯著小於或是未異於 *BEFORE* 的係數，代表 GCO 型一與型二錯誤皆是增加或是不變，支持假說 c。第四，若是 *AFTER* 的係數在未破產樣本未顯著異於 *BEFORE* 的係數，而破產樣本則是顯著大於 *BEFORE* 的係數，代表 GCO 型一錯誤持續，而 GCO 型二錯誤顯著下降，支持假說 d。最後，若是 *AFTER* 的係數在未破產樣本顯著小於 *BEFORE* 的係數，而破產樣本則是顯著小於或是未異於 *BEFORE* 的係數，代表 GCO 型一錯誤顯著下降，而 GCO 型二錯誤未減少，支持假說 e。詳細請參閱表 1。

二、變數衡量

(一) 研究變數 *BEFORE*、*AFTER*

BEFORE = 1，代表會計師被投保中心起訴之前的受查客戶，否則為 0⁸。相對地，*AFTER* = 1，代表會計師被投保中心起訴後的受查客戶，否則為 0。本文僅針對投保中心的團體訴訟案件，蓋實務上的證券團體訴訟，幾乎均由該中心辦理。又，查核報告由二位會計師簽名，肩負的法律責任皆相同，並未因主、副簽的角色而有不同，因此本文所謂的被告會計師，係指查核報告上至少一位會計師被告⁹。

8 若有會計師被投保中心多次起訴，則是指第一次起訴之前的年度。此外，本研究亦分析多次被告效果。在未破產樣本中，被告次數最多為 3 次，但所占的比率微乎其微。相對地，在破產樣本中，被告次數最多為 2 次，但只有一個觀察值。不論是以 *LITINUM* (被告次數) 取代 *AFTER*，或是以 *LIT11st* (第一次被告) 和 *LIT12nd+* (第二、三次被告) 取代 *AFTER*，實證結果仍與表 6 一致。

9 若是將被告會計師限定在主查會計師，並定義為第一位簽名者 (Chin and Chi, 2009; Chi and Chin, 2011)，或是採用 Aobdia, Lin, and Petacchi (2015) 的辨認方式 (2006 年以前取任期較長者，

(二) 控制變數

除了年度與產業之虛擬變數外，本研究針對審計人員與公司特性設立的控制變數敘述如下。過去文獻指出執業年資 (Sundgren and Svanstrom, 2014)、產業專長 (Reichelt and Wang, 2010)、客戶群組規模 (Sundgren and Svanstrom, 2014; Goodwin and Wu, 2016)、客戶重要性 (Blay and Geiger, 2013)、查核任期 (Chi, Myers, Omer, and Xie, 2017)、品牌聲譽 (Habib, 2013)、以及查核報告延遲日數 (Habib, 2013) 會影響審計品質，從而可能影響審計意見的正確性。*LNLEADAGE* 是指主簽會計師之執業年資，再取自然對數。*LEADSPEC* = 1，代表主簽會計師為產業專家，否則為 0¹⁰。*LNLEADSIZE* 是指主簽會計師查核的客戶數，再取自然對數。*C_LEAD* 是客戶總資產除以主簽會計師所有客戶總資產之合計數。*LNLEADTEN* 為主簽會計師的查核任期取自然對數。本文以第一位簽名會計師為主簽會計師 (Chin and Chi, 2009; Chi and Chin, 2011)¹¹。*BIG4* = 1，代表四大，否則為 0。*LNARL* 為查核報告日減資產負債表日後之差額再取自然對數。

在公司特性上，過去文獻 (Geiger, Gold, and Wallage, 2019; Carson, Fargher, Geiger, Lennox, Raghunandan, and Willekens, 2013) 指出公司規模 (*SIZE*) 愈小、獲利性 (*ROA*、*LOSS*) 愈差、負債比率 (*LEV*) 愈高、以及前期收到 GCO (*GCO_I*)，公司愈可能收到 GCO¹²。*SIZE* 是期末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ROA* 為繼續營業部門淨利除以平均總資產。*LOSS* = 1，代表本期發生虧損，否則為 0。*LEV* 是期末總負債除以期末總資產。*GCO_I* = 1，代表公司前期收到 GCO，否則為 0¹³。另外，參酌 Krishnan and Wang (2015)，本文亦控制公司年齡 (*LNAGE*)，但不設定符號預期。*LNAGE* 是公司成立年數取自然對數。最後，Sanoran (2018) 發現上市櫃公司較可能收到 GCO，因此控制上市狀態。*LIST* = 1，代表上市櫃公司，否則為 0。

之後則取第一位簽名者)，實證結果亦無重大改變。

- 10 根據 Neal and Riley (2004) 和 Reichelt and Wang (2010)，當會計師的產業別市場占有率大於平均產業內會計師人數的倒數的 1.2 倍時，即認定該會計師為產業專家 (*LEADSPEC* = 1)。
- 11 若是增加控制副簽會計師的特性，如年齡 (*LNCONCURATIONE*)、產業專長 (*CONCURSPEC*)、客戶數 (*LNCONCURSIZE*)，以及查核任期 (*LNCONCURTEN*)，實證結果並未有重大改變。類似地，若是增加控制會計師事務所的特性，如年齡 (*LNFIRMAGE*)、產業專長 (*FIRMSPEC*)、客戶重要性數 (*C_FIRM*)，以及查核任期 (*LNFIRMTEN*)，實證結果亦未有重大改變。
- 12 流動性是另一個常見影響 GCO 的公司特性，但因銀行與保險業的財務報表並無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項目，本文並未控制此特性。若模式 (1) 增加控制流動性 (*CR*)，並定義為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未破產樣本會降至 26,714，破產樣本則是減少至 220，實證結果並未有重大改變。
- 13 若是將樣本限定在首次出具 GCO，未破產樣本剩下 27,268 個，破產樣本剩下 167 個，重新執行分析，實證結果並無重大改變。

另一方面，若公司手頭有大額現金，審計人員可據以減緩對客戶繼續經營之疑慮 (DeFond et al., 2002; Reynolds and Francis, 2000)，公司收到 GCO 的可能性降低¹⁴。CASH 為公司現金和流動金融資產的合計數再除以總資產。

三、實證結果

(一) 敘述性統計分析

表 4 為各項變數之敘述性統計。所有的財務連續變數皆抑平 (Winsorize) 在上、下 1% 之內。在未破產樣本，會計師被起訴前 (BEFORE) 的樣本觀察值約占 27%，起訴後 (AFTER) 的樣本量則是 17%。相對地，在破產樣本，會計師被起訴前的樣本觀察值約占 43%，起訴後的樣本量則是 12%。不論是破產或未破產樣本，AFTER 的樣本量皆小於 BEFORE，可知訴訟事件會讓有些會計師退出審計市場¹⁵。四大 (BIG4) 在未破產樣本的查核比率高達 83%，但在破產樣本則是 70%。未破產樣本的上市櫃公司 (LIST) 較多，破產樣本則反之。在其他公司特性上，則是一致顯示未破產樣本的財務狀況皆較破產樣本為佳。

表 5 為被告會計師起訴前 (BEFORE)、後 (AFTER)、與未被告會計師 (NONLIT) 等三群樣本之 GCO 型一與型二錯誤的差異檢定。在未破產樣本，NONLIT 群組收到 GCO 的比率為 0.024，最低，而且皆顯著低於被告會計師起訴前、後的二群樣本，顯示被告會計師的 GCO 型一錯誤率高於未被告會計師。至於被告會計師起訴前、後的 GCO 變化，雖然 AFTER 群組的 GCO 比率小於 BEFORE 群組，在方向上是符合學習假說的預期，惟彼此之間的差異尚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因此這個初步的證據顯示被告會計師的 GCO 型一錯誤有持續的現象，符合蔓延假說的預測。

在破產樣本，AFTER 群組收到 GCO 的比率為 0.586，最高，而且皆邊際顯著高於 BEFORE 與 NONLIT 二群樣本，顯示被告會計師顯著降低 GCO 型二錯誤率，符合保守或學習假說的預測。綜合表 5，GCO 型一錯誤持續，型二錯誤減少，初步的證據支持假說 d。

14 前人文獻所控制的減緩因子尚包括 F_FIN ($t+1$ 年發行公司債與新股所募集到的資金) 或是 $F_ASTSALE$ ($t+1$ 年出售固定資產與權益投資的金額)。由於超過半數的破產樣本於聲請破產後，不再公告財務報告，若本文納入這二個變數，破產公司的樣本量將銳減為 106。基於樣本考量，本文不納入此二變數。

15 若是將被告會計師限定在起訴後仍繼續簽證者，未破產樣本剩下 27,671 個，破產樣本剩下 228 個，重新執行分析，實證結果並無重大改變。

表 4 敘述性統計

變數	未破產樣本			破產樣本		
	N = 27,888			N = 233		
	平均數	中位數	標準差	平均數	中位數	標準差
<i>GCO</i>	0.03	0.00	0.16	0.43	0.00	0.50
<i>BEFORE</i>	0.27	0.00	0.45	0.43	0.00	0.50
<i>AFTER</i>	0.17	0.00	0.38	0.12	0.00	0.33
<i>LNLEADAGE</i>	2.16	2.30	0.74	2.10	2.30	0.76
<i>LEADSPEC</i>	0.24	0.00	0.43	0.23	0.00	0.42
<i>LNLEADSIZE</i>	2.17	2.30	0.78	2.19	2.30	0.92
<i>C_LEAD</i>	0.16	0.07	0.22	0.19	0.09	0.25
<i>LNLEADTEN</i>	0.90	0.69	0.72	0.92	0.69	0.82
<i>BIG4</i>	0.83	1.00	0.38	0.70	1.00	0.46
<i>LNARL</i>	4.27	4.36	0.47	4.31	4.47	0.51
<i>SIZE</i>	14.65	14.39	1.85	14.64	14.73	1.77
<i>ROA</i>	-0.02	0.00	0.12	-0.12	-0.08	0.15
<i>LOSS</i>	0.51	1.00	0.50	0.88	1.00	0.33
<i>LEV</i>	0.48	0.49	0.24	0.71	0.73	0.29
<i>GCO_1</i>	0.02	0.00	0.15	0.28	0.00	0.45
<i>LNAGE</i>	2.81	2.95	0.78	2.72	2.78	0.77
<i>LIST</i>	0.59	1.00	0.49	0.45	0.00	0.50
<i>CASH</i>	0.21	0.14	0.20	0.13	0.04	0.22
<i>AFTER_SET</i>	0.06	0.00	0.24	0.05	0.00	0.22
<i>AFTER_SUI</i>	0.11	0.00	0.31	0.07	0.00	0.26
<i>AFTER_WIN</i>	0.05	0.00	0.21	0.01	0.00	0.11
<i>AFTER_LOS</i>	0.01	0.00	0.10	0.00	0.00	0.00
<i>AFTER_BAN</i>	0.08	0.00	0.28	0.08	0.00	0.27
<i>AFTER_UNB</i>	0.09	0.00	0.29	0.04	0.00	0.20
<i>FBEFORE</i>	0.17	0.00	0.37	0.27	0.00	0.45
<i>FAFTER</i>	0.76	1.00	0.43	0.60	1.00	0.49

註 1：變數衡量請參閱附錄。

表 5 單變量差異檢定

第一部分：未破產樣本

變數：GCO 樣本群組	第一組 樣本量	第一組 平均數	第二組 樣本量	第二組 平均數	t 值	z 值
NONLIT vs. BEFORE	15,498	0.024	7,655	0.035	-4.67***	-4.98***
NONLIT vs. AFTER	15,498	0.024	4,735	0.031	-2.74***	-2.95***
BEFORE vs. AFTER	7,655	0.035	4,735	0.031	1.10	1.09
BEFORE vs. AFTER_SET	7,655	0.035	1,705	0.033	0.30	0.30
BEFORE vs. AFTER_SUI	7,655	0.035	3,065	0.030	1.40	1.35
BEFORE vs. AFTER_WIN	7,655	0.035	1,319	0.021	3.04***	2.57***
BEFORE vs. AFTER_LOS	7,655	0.035	272	0.004	7.37***	2.80***
BEFORE vs. AFTER_BAN	7,655	0.035	2,311	0.044	-1.94*	-2.07**
BEFORE vs. AFTER_UNB	7,655	0.035	2,545	0.019	4.54***	3.94***
FBEFORE vs. FAFTER	4,674	0.035	21,631	0.024	3.85***	4.33***

第二部分：破產樣本

變數：GCO 樣本群組	第一組 樣本量	第一組 平均數	第二組 樣本量	第二組 平均數	t 值	z 值
NONLIT vs. BEFORE	104	0.413	100	0.410	0.05	0.05
NONLIT vs. AFTER	104	0.413	29	0.586	-1.66*	-1.65*
BEFORE vs. AFTER	100	0.410	29	0.586	-1.68*	-1.67*
BEFORE vs. AFTER_SET	100	0.410	12	0.500	-0.59	-0.59
BEFORE vs. AFTER_SUI	100	0.410	17	0.647	-1.83*	-1.81*
BEFORE vs. AFTER_BAN	100	0.410	19	0.632	-1.79*	-1.77*
BEFORE vs. AFTER_UNB	100	0.410	10	0.500	-0.55	-0.55
FBEFORE vs. FAFTER	64	0.313	141	0.461	-2.01**	-2.00**

註 1：*, **, *** 分別代表 10%、5%、與 1% 之顯著水準，雙尾檢定。

註 2：符號說明

- GCO 虛擬變數。1，代表公司本期收到 GCO，否則為 0。
- NONLIT 無起訴紀錄的會計師的受查客戶。
- BEFORE 會計師被起訴之前的受查客戶。
- AFTER 會計師被起訴之後的受查客戶。
- AFTER_SET 採和解策略的會計師被起訴之後的受查客戶。
- AFTER_SUI 採訴訟策略的會計師被起訴之後的受查客戶。
- AFTER_WIN 會計師被一審法院判決勝訴之後的受查客戶。
- AFTER_LOS 會計師被一審法院判決敗訴之後的受查客戶。
- AFTER_BAN 訴訟事件公司破產的會計師被起訴之後的受查客戶。
- AFTER_UNB 訴訟事件公司未破產的會計師被起訴之後的受查客戶。
- FBEFORE 會計師事務所被起訴之前的受查客戶。
- FAFTER 會計師事務所被起訴之後的受查客戶。

(二) 迴歸結果

表 6 為 GCO 之羅吉斯迴歸結果。本文所有的標準誤皆採用調整會計師集群的穩健標準誤 (Clustering Robust Standard Error)¹⁶。未破產樣本的結果顯示 *BEFORE* 的係數顯著為正，*AFTER* 的係數亦顯著為正，表 6 最下方的 Wald 檢定結果顯示二者的差異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p 值 = 0.812)¹⁷。此代表起訴前，被告會計師相較於未被告會計師較可能犯 GCO 型一錯誤；起訴後，被告會計師仍持續犯此錯誤。GCO 型一錯誤不因審計訴訟而改變，支持蔓延假說。破產樣本的結果顯示 *BEFORE* 的係數方向為負，但不顯著。此代表起訴前，被告會計師與未被告會計師的 GCO 型二錯誤並無顯著差異。然而 *AFTER* 的係數顯著為正，而且 Wald 檢定結果顯示二者的差異具統計顯著性 (p 值 = 0.025)，代表起訴後，被告會計師較可能對即將破產公司出具 GCO，顯著提升 GCO 正確性。GCO 型二錯誤在審計訴訟後顯著降低，可能支持學習或保守假說。由於保守假說預測 GCO 型一錯誤顯著上升，而且型二錯誤顯著下降，鑒於本文並未發現 GCO 型一錯誤顯著上升之證據，因此表 6 的證據並不支持保守假說。整體而言，表 6 的證據顯示審計訴訟並未全面提升 GCO 正確性，會計師被告後，顯著改善 GCO 型二錯誤，卻仍持續 GCO 型一錯誤，假說 d 得到支持。

控制變數的結果顯示，查核報告日數 (*LNARL*) 愈長、財務狀況 (*ROA*、*LEV*) 愈差，以及前期收到 GCO，公司愈可能收到 GCO。有趣的是 *BIG4* 的係數在未破產樣本顯著為負，在破產樣本則否，顯示四大較不可能犯 GCO 型一錯誤。*LNLEADTEN* 的係數在破產樣本顯著為負，顯示會計師的查核任期愈長，較可能犯 GCO 型二錯誤，與 Read and Yezege (2016) 之證據一致。

16 本文利用最小平方迴歸估計實證模式 (1) 的變異數膨脹因子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破產樣本 *LNLEADSIZE* 的 *VIF* 最大，為 6.13，其次是 *C_LEAD*，為 5.02。二者的 Spearman 相關係數為 -0.78。為避免二者的共線性影響本文結果，一次刪除其中一個變數，實證結果並未有重大改變。至於未破產樣本，最大的 *VIF* 為 3.71。總之，實證模式 (1) 並無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17 不可諱言，起訴日與舞弊案件爆發日有間隔，期間會計師可能已經開始檢討自己並改善審計品質。換言之，*BEFORE* 的衡量偏誤可能造成本文觀察不到訴訟前後的審計品質顯著差距。林郁馨 (2014) 發現財報不實案件的最後不法期日至投保中心起訴日平均約需 25.25 個月。基於此，本文採取 2 種作法以排除舞弊案件爆發後至起訴這一段期間的審計品質變化雜訊。一是將 *BEFORE* 重新定義為會計師被投保中心起訴前二年之前的受查客戶，二是刪除會計師被投保中心起訴前一年與前二年的觀察值。實證結果並無重大差異。

表 6 GCO 正確性與審計訴訟之羅吉斯迴歸結果

應變數：GCO 自變數	未破產樣本		破產樣本	
	係數	穩健標準誤	係數	穩健標準誤
<i>BEFORE</i>	0.45***	0.14	-0.67	0.99
<i>AFTER</i>	0.41***	0.16	3.78***	1.35
<i>LNLEADAGE</i>	0.03	0.10	-0.97	0.99
<i>LEADSPEC</i>	0.06	0.16	1.29	0.84
<i>LNLEADSIZE</i>	-0.08	0.14	-3.61*	1.88
<i>C_LEAD</i>	-0.26	0.43	-4.34	3.66
<i>LNLEADTEN</i>	0.13	0.09	-2.73***	1.00
<i>BIG4</i>	-0.50***	0.18	0.27	2.13
<i>LNARL</i>	0.39***	0.13	7.17***	2.75
<i>SIZE</i>	-0.23***	0.05	0.52	0.53
<i>ROA</i>	-5.98***	0.51	-6.79**	3.25
<i>LOSS</i>	1.36***	0.15	1.56	1.35
<i>LEV</i>	3.96***	0.31	16.97***	6.59
<i>GCO_1</i>	4.68***	0.18	8.78**	3.92
<i>LNAGE</i>	0.26***	0.10	0.33	0.63
<i>LIST</i>	0.21	0.15	2.47	1.58
<i>CASH</i>	-1.90***	0.50	-5.99	6.77
<i>Intercept</i>	-6.80***	1.11	-50.59***	15.69
<i>Years</i>	Yes		Yes	
<i>Industries</i>	Yes		Yes	
樣本量	27,888		233	
Wald χ^2	2123***		151***	
Pseudo- R^2	0.564		0.813	
<i>p</i> 值 (<i>BEFORE</i> = <i>AFTER</i>)	0.812		0.025	

註 1：*，**，*** 分別代表 10%、5%、與 1% 之顯著水準，雙尾檢定。

註 2：變數符號定義說明請參閱附錄。

伍、額外分析

一、訴訟特性分析

上節的分析顯示會計師被告後並未顯著降低犯 GCO 型一錯誤的可能性，但顯著降低犯 GCO 型二錯誤的可能性，於此節本文將深入研究審計訴訟案件的特性，以明瞭某些特性是否更相關，因而在增強被告會計師 GCO 正確性方面更有價值。首先考慮的特性是訴訟策略。有些會計師會對審計訴訟案件選擇庭外和解策略，有些則是靜待法院判決。因此本文將變數 *AFTER* 替換為二個新的變數：選擇和解的會計師被投保中心起訴後的受查客戶 (*AFTER_SET*) 和選擇訴訟的會計師被投保中心起訴後的受查客戶 (*AFTER_SUI*)。此外，選擇訴訟的會計師按照後續一審法院的判決結果，乃再新設二個變數：*AFTER_WIN* = 1，一審法院判決會計師勝訴後的受查

客戶，否則為 0。 $AFTER_LOS = 1$ ，一審法院判決會計師敗訴後的受查客戶，否則為 0。

這四個新變數的敘述性統計呈現於表 4。不論是破產或未破產樣本， $AFTER_SET$ 的平均數皆小於 $AFTER_SUI$ ，顯示大部分的被告會計師並未選擇和解策略。 $AFTER_WIN$ 的平均數皆大於 $AFTER_LOS$ ，顯示大部分的被告會計師被一審法院判決無須賠償¹⁸。這四個新變數與 $BEFORE$ 群組的 GCO 差異檢定呈現於表 5。表 5 第一部份顯示在未破產樣本，不論是 $AFTER_SET$ 或 $AFTER_SUI$ 群組，皆與 $BEFORE$ 群組的 GCO 比率不具顯著差異。有趣的是， $AFTER_WIN$ 與 $AFTER_LOS$ 群組的 GCO 比率，皆顯著小於 $BEFORE$ 群組。此代表一審判決後，不論是勝訴或敗訴，會計師較敢對未破產公司不出具 GCO。表 5 第二部份顯示在破產樣本， $AFTER_SUI$ 與 $BEFORE$ 群組的 GCO 比率達邊際顯著差異¹⁹。

其次，本文考量訴訟事件公司是否在起訴前聲請破產，並將變數 $AFTER$ 替換為二個新的變數：訴訟事件公司破產的被告會計師在被投保中心起訴後的受查客戶 ($AFTER_BAN$)，以及訴訟事件公司未破產的被告會計師在被投保中心起訴後的受查客戶 ($AFTER_UNB$)。這二個新變數的敘述性統計呈現於表 4。在未破產樣本， $AFTER_BAN$ 的平均數小於 $AFTER_UNB$ ，而破產樣本則反之。二個新變數的差異檢定呈現於表 5。表 5 顯示在第一部分未破產樣本， $AFTER_BAN$ 群組的 GCO 比率顯著高於 $BEFORE$ 群組，但 $AFTER_UNB$ 群組的 GCO 比率，則是顯著低於 $BEFORE$ 群組。至於第二部分的破產樣本， $AFTER_BAN$ 群組的 GCO 比率顯著高於 $BEFORE$ 群組。綜合 $AFTER_BAN$ 在破產與未破產樣本的證據，顯示訴訟事件公司的破產經驗，讓會計師較傾向出具 GCO。

表 7 呈現訴訟特性的羅吉斯迴歸結果，第一部分為未破產樣本結果。第 (1) 欄顯示 $AFTER_SUI$ 的係數顯著為正， $AFTER_SET$ 則否，但不論是 $AFTER_SET$ 或是 $AFTER_SUI$ ，各自與 $BEFORE$ 的係數差異皆未達統計顯著性，顯示被告會計師對 GCO 型一錯誤的持續性，不因其所採取的訴訟策略而不同。然而有趣的是， $AFTER_WIN$ 的係數符號顯著為負，此代表一審法院判決會計師勝訴後，讓會計師更有信心不對未破產公司出具 GCO，因而相較起訴後、一審判決前，降低了 GCO 型一錯誤。第 (2) 欄顯示 $AFTER_BAN$ 的係數顯著為正， $AFTER_UNB$ 則否，但不論

18 在表 4 未破產樣本， $AFTER_WIN$ 的平均數為 0.05， $AFTER_LOS$ 則是 0.01，二者平均數總和未達 $AFTER_SUI$ 平均數 0.11，代表差額 0.05 為一審法院判決前之觀測值之平均數。同理，破產樣本一審判決前之平均數為 0.06。

19 破產樣本並無 $AFTER_LOS$ 的樣本，而 $AFTER_WIN$ 則僅有 3 個觀察值，因此表 5 與表 7 的破產樣本不增設此二個變數。

是 *AFTER_BAN* 或是 *AFTER_UNB*，各自與 *BEFORE* 的係數差異皆未達統計顯著性，顯示被告會計師對 GCO 型一錯誤的持續性，並未顯著受到訴訟事件公司破產經驗的影響。

表 7 第二部份是破產樣本的結果。第 (1) 欄是訴訟策略的分析。不論是 *AFTER_SET* 或是 *AFTER_SUI* 的係數皆顯著為正，而且各自與 *BEFORE* 的係數差異亦皆達統計顯著性，顯示被告會計師對 GCO 型二錯誤的改善，不因採取的訴訟策略而不同。第 (2) 欄是訴訟事件公司是否破產的分析。*AFTER_BAN* 的係數顯著為正，而且與 *BEFORE* 的係數差異達統計顯著性，顯示具備訴訟事件公司破產經歷的被告會計師，會從過去客戶破產的經驗中學習，更能正確評估公司繼續經營疑慮的影響因素，因而降低後續犯 GCO 型二錯誤的可能性。

二、制度變遷影響分析

本研究期間 (1999-2023) 橫跨 25 年，歷經多起重大弊案以及相關法律修正，此皆影響會計師的訴訟風險。張瑞當、沈文華與方俊儒 (2009) 認為 2004 年的博達案提高了會計師的訴訟風險。至於法律之實施或修正，2003 年 1 月 1 日施行投保法，並因而成立投保中心。2006 年證交法增訂第 20 條之一，確認會計師對財務報告承擔過失責任，並依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2007 年會計師法重大修正，明確界定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屬於合夥組織，並賦予金管會檢查會計師事務所之職權。最後，2016 年審計準則 57 號公報實施，不再有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亦可能影響會計師出具 GCO 的考量。為減緩本研究結果係反映制度變革之效果，本研究乃針對這些事件，進行五種切割，即（一）投保法施行前 (1999-2002)、後 (2003-2023)，（二）博達案前 (1999-2003)、後 (2004-2023)，（三）證交法修正前 (1999-2005)、後 (2006-2023)，（四）會計師法修正前 (1999-2006)、後 (2007-2023)，以及（五）57 號公報前 (1999-2015)、後 (2016-2023)。除了 2016-2023 的破產樣本僅剩下 14 個觀察值，無法迴歸外，其餘未列表的結果與表 6 一致，顯示本文的結果並未重大受到制度變革的干擾。

三、訴訟後時間效果分析

法律訴訟的效果可能會隨時間經過而改變。為了避免本文因觀察期過長，學習或保守效果因時間而遞減，導致本文結果偏誤且有利於蔓延假說，因此本文縮短 *AFTER* 的觀察期，重新定義 *AFTER*，分別為會計師被起訴後 1 年、5 年，以及 10 年內之受查客戶。未列表的結果仍與表 6 一致，顯示本文的證據並未重大受到時間遞減效果的干擾。

表 7 GCO 正確性與訴訟特性之羅吉斯迴歸結果

第一部分：未破產樣本 ($N = 27,888$)

應變數：GCO		(1)		(2)	
自變數	係數	穩健標準誤	係數	穩健標準誤	
<i>BEFORE</i>	0.47***	0.15	0.46***	0.14	
<i>AFTER_SET</i>	0.33	0.25			
<i>AFTER_SUI</i>	0.76***	0.20			
<i>AFTER_WIN</i>	-0.81**	0.37			
<i>AFTER_LOS</i>	-1.52	0.93			
<i>AFTER_BAN</i>			0.57***	0.16	
<i>AFTER_UNB</i>			0.20	0.25	
<i>Controls</i>	Yes		Yes		
<i>Years</i>	Yes		Yes		
<i>Industries</i>	Yes		Yes		
Pseudo- R^2		0.565		0.564	
p 值 (<i>BEFORE</i> = <i>AFTER_SET</i>)		0.588			
p 值 (<i>BEFORE</i> = <i>AFTER_SUI</i>)		0.158			
p 值 (<i>BEFORE</i> = <i>AFTER_BAN</i>)				0.558	
p 值 (<i>BEFORE</i> = <i>AFTER_UNB</i>)				0.308	

第二部分：破產樣本 ($N = 233$)

應變數：GCO		(1)		(2)	
自變數	係數	穩健標準誤	係數	穩健標準誤	
<i>BEFORE</i>	-0.69	1.00	-0.67	0.99	
<i>AFTER_SET</i>	3.87*	2.13			
<i>AFTER_SUI</i>	3.71**	1.54			
<i>AFTER_BAN</i>			3.74**	1.83	
<i>AFTER_UNB</i>			3.85*	2.27	
<i>Controls</i>	Yes		Yes		
<i>Years</i>	Yes		Yes		
<i>Industries</i>	Yes		Yes		
Pseudo- R^2		0.813		0.813	
p 值 (<i>BEFORE</i> = <i>AFTER_SET</i>)		0.088			
p 值 (<i>BEFORE</i> = <i>AFTER_SUI</i>)		0.036			
p 值 (<i>BEFORE</i> = <i>AFTER_BAN</i>)				0.059	
p 值 (<i>BEFORE</i> = <i>AFTER_UNB</i>)				0.094	

註 1：*，**，*** 分別代表 10%、5%、與 1% 之顯著水準，雙尾檢定。

註 2：變數符號定義說明請參閱附錄。

註 3：Controls 代表控制變數向量，未列表的結果均與表 6 相近。

四、被告會計師事務所分析

為了觀察訴訟對會計師個人與會計師事務所の影響是否不同，此處新增 2 個變數。*FAFTER* = 1，代表事務所被投保中心第一次起訴後的受查客戶，否則為 0。同理，*FBEFORE* = 1，代表事務所被投保中心第一次起訴前的受查客戶，否則為 0。這二個新變數的敘述性統計呈現於表 4。在未破產樣本，*FBEFORE* 的平均數為 0.17，*FAFTER* 則是 0.76，二者合計數為 0.93，顯示高達 9 成的樣本他們的會計師事務所所有被告的紀錄。在破產樣本，會計師事務所所有被告的紀錄亦甚高。二個新變數的差異檢定呈現於表 5。在表 5 的未破產樣本，*FAFTER* 群組的 GCO 比率顯著低於 *FBEFORE* 群組，而破產樣本則是反之。單變量的證據顯示被告事務所改善 GCO 型一、型二錯誤的現象，但因此處未考量控制變數之影響，不宜進行推論。相關羅吉斯迴歸結果呈現於表 8。表 8 未破產樣本的結果顯示，*FAFTER* 與 *FBEFORE* 的係數皆不顯著，而且二者的差異也不顯著，代表在 GCO 型一錯誤上，被告事務所與未被告事務所並無顯著差異。然而不同於 *FAFTER* 與 *FBEFORE* 的結果，*AFTER* 與 *BEFORE* 的結果與表 6 未破產樣本相近，顯示被告會計師較可能犯 GCO 型一錯誤，乃其個人因素所造成，支持審計品質深受會計師個人因素的影響。

相對地，在破產樣本，*FBEFORE* 的係數方向為負，而 *FAFTER* 的係數方向則為正。雖然二者皆不顯著，但其差異數已達統計顯著水準 (p 值 0.001)，此代表事務所被告後犯 GCO 型二錯誤的可能，顯著低於被告前。至於 *AFTER* 與 *BEFORE* 的結果，仍與表 6 相近。整體而言，表 8 的證據顯示被告事務所的 GCO 型一與型二錯誤皆未顯著異於未被告事務所，但是審計訴訟的經驗讓事務所顯著降低自己犯 GCO 型二錯誤的可能。至於 *AFTER* 與 *BEFORE* 的證據，一樣支持假說 d。

陸、結論

本研究目的乃在探討過去被告的會計師後續是否改善審計品質。前人文獻對審計失敗的後續影響共有三種理論假說預期。一是蔓延假說，預期發生審計失敗的當事人繼續維持低品質審計 (Francis and Michas, 2013)。二是學習假說，預期審計人員會從審計失敗的經驗中學習，因而改善後續的審計品質 (Lennox and Li, 2014)。最後是保守假說，預期訴訟的經驗將誘使審計人員在後續的審計案件中從事更保守的行為以避免未來的訴訟 (Schmidt, 2009)。

本文以 1999 至 2023 年臺灣公開公司為研究樣本，以 GCO 正確性衡量審計品質，實證結果發現過去被告的會計師後續仍持續對未破產公司出具 GCO，並顯著增加對即將破產公司出具 GCO 的可能。換言之，審計訴訟並未顯著影響會計師犯 GCO 型一錯誤的持續性，但會顯著降低 GCO 型二錯誤。在訴訟特性上，本文發現

表 8 GCO 正確性與審計訴訟之羅吉斯迴歸結果——納入被告事務所分析

應變數：GCO 自變數	未破產樣本		破產樣本	
	係數	穩健標準誤	係數	穩健標準誤
<i>BEFORE</i>	0.42***	0.15	-1.70	1.56
<i>AFTER</i>	0.38**	0.16	4.19*	2.15
<i>FBEFORE</i>	0.16	0.27	-3.92	3.52
<i>FAFTER</i>	0.23	0.26	1.52	3.09
<i>Controls</i>	Yes		Yes	
<i>Years</i>	Yes		Yes	
<i>Industries</i>	Yes		Yes	
樣本量	27,888		233	
Pseudo- R^2	0.564		0.837	
p 值 (<i>BEFORE</i> = <i>AFTER</i>)	0.814		0.030	
p 值 (<i>FBEFORE</i> = <i>FAFTER</i>)	0.689		0.001	

註 1：*，**，*** 分別代表 10%、5%、與 1% 之顯著水準，雙尾檢定。

註 2：變數符號定義說明請參閱附錄。

註 3：*Controls* 代表控制變數向量，未列表的結果均與表 6 相近。

庭外和解或庭內訴訟二種訴訟策略並未產生不同的結果，但是 GCO 型一錯誤的蔓延現象在一審法院判決會計師勝訴後，會減緩。另外，被告會計師犯 GCO 型一錯誤的蔓延性以及型二錯誤的改善學習效果，較凸顯於有訴訟事件公司破產經驗的被告會計師。整體而言，會計師的 GCO 型一錯誤並不因審計訴訟而改變，支持蔓延假說。相對地，GCO 型二錯誤則會因審計訴訟而顯著降低，支持學習假說。

除了被告會計師個人外，本文也分析被告會計師任職事務所的 GCO 正確性變化。被告會計師犯 GCO 型一錯誤的風格，僅限於其個人，並未蔓延至整個會計師事務所。然而，審計訴訟帶來的學習效果，卻並不僅侷限於被告會計師個人，被告事務所藉由訴訟事件公司的查核缺失，改善品質管制制度，顯著降低整體事務所的 GCO 型二錯誤。整體而言，蔓延假說的證據存在於犯 GCO 型一錯誤的會計師，學習假說的證據存在於犯 GCO 型二錯誤的會計師及其任職的會計師事務所。

本文訴訟資料來源僅涵蓋由投保中心所承辦之案件，並未納入由個別投資人或公司單獨提起之訴訟。此一資料來源限制恐產生樣本選擇偏誤，造成樣本訴訟案件偏重高訴訟嚴重性或是公共性特質。因此在推論未涉重大訴訟之會計師行為時，實證結果的外部效度可能受到影響，此為本文研究限制。未來研究若能克服資料蒐集之限制，可納入由個別投資人或公司單獨提起之訴訟，進一步比較訴訟嚴重性是否差異化影響會計師的後續行為。此外，司法訴訟與行政監督（如懲戒）皆為影響審計人員提供高品質審計的機制。未來研究可比較審計訴訟與懲戒對會計師行為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性？若有，何者為主要影響？

Does Litigation Experience Improve Audit Partners' Audit Quality?

Wen-Ching Chang,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1. Purpose/Objective

Litigation is one of the mechanisms used by the economic system to maintain audit quality. However, most prior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whether litigation has deterrent effects on the non-litigant auditors, rather than exploring whether litigation has corrective effects on the litigants themselves. This study extends previous research by examining whether audit partners who defend against litigation (hereafter defendant partners) subsequently improve audit quality.

Geiger and Rama (2006) indicate that high-quality auditors are better able to discern whether their opinions should be modified to address their clients' going-concern difficulties. Greater accuracy can lead to lower error rates of going-concern opinions (GCOs), which is a measurable indicator of auditors' high-quality reporting decisions (Geiger and Rama, 2006; Knechel and Vanstraelen, 2007). In this study, I examine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ve proportions of the two types of GCO errors before and after audit partners are sued: GCOs issued to clients who do not subsequently go bankrupt (Type I errors) and GCOs not issued to subsequently bankrupt clients (Type II errors).

Prior research has presented three hypotheses to explain defendant auditors' subsequent behavior. The contagious hypothesis posits that auditors who experience audit failures continue to conduct lower-quality audits in subsequent years (Francis and Michas, 2013; Knechel, Vanstraelen, and Zerni, 2015; Li, Qi, Tian, and Zhang, 2017), meaning that defendant auditors are unlikely to reduce GCO error rates in subsequent periods. Unchanged or increased GCO Type I or Type II error rates would indicate that defendant auditors have contagious reporting problems. The learning hypothesis suggests that auditors learn from prior audit failures and take remedial actions to improve subsequent audit quality (Lennox and Li, 2014). A decrease in defendant auditors' GCO Type I or Type II errors would support the learning hypothesis. Finally, the conservative hypothesis holds that litigation prompts auditors to engage in more conservative behavior in all

subsequent audits to avoid future litigation (Schmidt, 2009). Such conservatism would lead defendant auditors to issue more GCOs, causing lower Type II and higher Type I error rates (Geiger and Rama, 2006).

The three theoretical hypotheses are not necessarily mutually exclusive. In fact, multiple factors interact, although empirically, only the effects of dominant factors can be detected (Liu and Elayan, 2015). The empirical evidence provided in this study can help determine which of the three hypotheses is predominantly influential.

2.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In this study, I obtain audit partner litigation data from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vestors Protection Center (SFIPC) in Taiwan and bankruptcy data from multiple sources (e.g., Google searches for reasons for firm delisting, material information filings from the Market Observation Post System, or information about business registration from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etc.). Other data are retrieved from the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database. The final sample consists of 27,888 firm-year observations of financially distressed firms that survived between 1999 and 2023 (the nonbankrupt sample) and 233 firm-year observations of distressed firms that went bankrupt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e bankrupt sample).

The empirical model for this study is as follows:

$$GCO = \beta_0 + \beta_1 BEFORE + \beta_2 AFTER + Controls + v \dots, \quad (1)$$

where *GCO* is coded as one if the firm receives a GCO in the current period, and zero otherwise. *BEFORE* and *AFTER* are the variables of interest. *BEFORE* equals one if the firm is audited by a defendant partner before the partner is sued, and zero otherwise. *AFTER* equals one if the firm is audited by a defendant partner after the partner has been sued, and zero otherwise. *Controls* stands for a vector of control variables.

I estimate Model 1 using data for the nonbankrupt sample to obtain evidence of GCO Type I errors. Prior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 single audit failure can systematically reflect the lower overall audit quality of the involved auditor (Chang, Chen, Chou, and Ko, 2016; Francis and Michas, 2013; Li et al., 2017). Accordingly, the coefficient for *BEFORE* is expected to be positive for the nonbankrupt sample, indicating that defendant partners are more likely to commit GCO Type I errors before litigation than nondefendant partners. In

contrast, I estimate Model 1 using data for the bankrupt sample to obtain evidence of GCO Type II errors. The coefficient for *BEFORE* is expected to be negative for the bankrupt sample, suggesting that defendant partners are more likely to commit GCO Type II errors before litigation than nondefendant partners.

A decrease in GCO Type I errors is observed when the coefficient for *AFTER* for the nonbankrupt sample i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for *BEFORE*. In contrast, a decrease in Type II GCO errors is observed when the coefficient for *AFTER* for the bankrupt sample i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e coefficient for *BEFORE*. The learning hypothesis would be supported if the coefficient for *AFTER* for the nonbankrupt sample i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e coefficient for *BEFORE*, or is significantly larger for the bankrupt sample than the coefficient for *BEFORE*. However, the contagious hypothesis would be supported if the coefficient for *AFTER* for the nonbankrupt sample is not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e coefficient for *BEFORE* (no reduction in GCO Type I errors), or is not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for *BEFORE* for the bankrupt sample (no reduction in GCO Type II errors). Finally, the conservative hypothesis would be supported if the coefficient for *AFTER* i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e coefficient for *BEFORE* for both the nonbankrupt and bankrupt samples (i.e., increases in GCO Type I errors and decreases in GCO Type II errors).

3. Findings

The empirical results for GCO Type I errors show that, compared to other partners, defendant partners tend to issue GCOs for nonbankrupt firms both before and after being sued. Moreover, the differences in the likelihood of committing GCO Type I errors between the pre- and post-litigation periods do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fendant partners themselves. This suggests that defendant partners fail to improve their subsequent audit quality and continue to commit GCO Type I errors. Nevertheless, the contagion phenomenon is mitigated after the district courts rule in favor of the defendant partners.

Regarding the results for GCO Type II errors before litigation, defendant partners do not differ from other partners in their likelihood of issuing GCOs to soon-to-go-bankrupt firms. However, after litigation, defendant partners are more likely to issue GCOs to soon-

to-go-bankrupt firms. More importantly, the reduction in the likelihood of committing GCO Type II errors reache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for defendant partners, indicating that audit partners improve their audit quality and commit fewer GCO Type II errors after being sued. The analysis of litigation characteristics shows that the reduction of GCO Type II errors is mainly observed among defendant partners whose litigated event clients go bankrupt.

Overall, litigation experience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audit partners' GCO Type I errors, supporting the contagious hypothesis. In contrast, audit partners commit significantly fewer GCO Type II errors after litigation, supporting the learning hypothesis.

4. Research Limitations/Implications

The litigation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only cases of audit partners being sued by the SFIPC; thus, they do not incorporate lawsuits initiated by individual investors or firms. This data limitation may have led to sample selection bias, resulting in litigation cases skewed toward greater damage claims or allegations of harm to the public interest. Consequently, my results may not be generalizable to defendant partners involved in minor cases of litigation, which constitutes a limitation of this study.

With respect to policy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mposing legal liability on auditors for negligence alerts auditors to maintain audit quality and protects investors. Whether litigation effectively enhances audit quality is therefore of critical importance to investors, firms, regulators, and auditor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investors and firms should consider audit partners' litigation track records when assessing changes in audit quality. In terms of regulatory oversigh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defendant partners do not completely improve their audit quality following litigation. Accordingly, regulators should strengthen substantive review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audited by partners with litigation experience and conduct quality-control inspections at their audit firms. Finally, the evidence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GCO Type I errors do not decrease in the short term following litigation. Audit partners should continuously reduce GCO Type I errors to avoid weakening the warning effect of GCOs in signaling firms' going-concern difficulties.

5. Contributions

This study complements several contributions to the auditing literature. First, the study responds to the calls of Anantharaman, Pittman, and Wans (2016) and Chy, Franco, and Su (2021)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al environments and auditors' behavior. Second, avoiding litigation is an important incentive for auditors to maintain audit quality (Khurana and Raman, 2004). However, empirical evidence on whether litigation positively influences negligent auditors' behaviors is limited. This study supplements litigation-avoidance theory by providing evidence that defendant partners subsequently improve audit quality following litigation. Third, because audit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liable for audit negligence, the existing audit litigation literature primarily documents evidence at the audit firm or office level (Lennox and Li, 2014; Schmidt, 2009). In contrast, signing audit partners in Taiwan assume legal liability. This study extends the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evidence of audit litigation at the partner level. Fourth, Anantharaman et al. (2016) show that litigation risk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auditors issuing GCOs to financially distressed clients. However, they do not determine whether auditors respond to litigation risk by improving audit quality or by increasing conservatism. This study uses GCO Type I and II error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learning hypothesis and the conservative hypothesis, and obtains results that do not support the conservative hypothesis. Fifth, concern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udit failures at the partner level, prior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audit failure events, such as financial restatements (Li et al., 2017), GCO errors (Knechel et al., 2015), and regulatory sanctions (Chang et al., 2016; Hung and Yen, 2011). This study extends the audit failure consequence literature by using audit litigation as a proxy for audit failure events. Finally, audit work is performed by individual auditors, and prior studies (e.g., DeFond and Francis, 2005; DeFond and Zhang, 2014; Francis, 2011) hav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providing evidence at the partner level. By offering evidence of the effects of partners' litigation experiences, this study responds to their call.

Future researchers may overcome the data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by incorporating lawsuits initiated by investors or firms, thereby allowing for comparisons of whether the degree of public interest damage differentially affects auditors' behavior following lawsuits. Moreover, the aim of both judicial litig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oversight

mechanisms (such as disciplinary sanctions) is to maintain high-quality auditing. Future researchers could examine whether audit litigation and disciplinary actions differentially affect auditors' behavior and, if so, which mechanism has the dominant influence.

References

- 何里仁與李雅涵，2024，訴訟風險與會計師關鍵查核事項之揭露，*會計評論*，79期：97-155。https://doi.org/10.6552/JOAR.202407_(79).0003 (He, Li-Jen, and Lee, Ya-Han. 2024. Litigation risk and auditors'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view*, 79: 97-155. https://doi.org/10.6552/JOAR.202407_(79).0003)
- 林俊宏，2014，團體訴訟制度保護投資人權益，*證券服務*，625期：27-28。(Lin, Chun-Hong. 2014. The class action system protects investors. *Securities Services*, 625: 27-28.)
- 林郁馨，2014，投資人的諾亞方舟——投資人保護中心與證券團體訴訟之實證研究，*月旦法學雜誌*，229期：75-97。https://doi.org/10.3966/102559312014060229005 (Lin, Yu-Hsin. 2014. Noah's ark for investors: An empirical study of securities class action and the investor protection center in Taiwan. *The Taiwan Law Review*, 229: 75-97. https://doi.org/10.3966/102559312014060229005)
- 洪玉舜與顏信輝，2011，會計師懲戒程度對簽證保守性之影響，*管理學報*，28卷4期：325-343。https://doi.org/10.6504/JOM.2011.28.04.02 (Hung, Yu-Shun, and Yen, Sin-Hui. 2011. Impact of CPA discipline on auditor conservatism. *Journal of Management*, 28 (4): 325-343. https://doi.org/10.6504/JOM.2011.28.04.02)
- 張瑞當、沈文華與方俊儒，2009，博達案對會計師簽發繼續經營有重大疑慮查核意見之影響：調節效果之探討，*臺大管理論叢*，19卷2期：75-108。https://doi.org/10.6226/NTURM2009.19.2.75 (Chang, Ruey-Dang, Shen, Wen-Hua, and Fang, Chun-Ju. 2009. The effects of the Procomp scandal on going concern audit opinion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s. *NTU Management Review*, 19 (2): 75-108. https://doi.org/10.6226/NTURM2009.19.2.75)
- Ahn, J., and Jensen, K. L. 2018. Quality control in audit firms: Do auditors learn from going concern errors?.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Research Paper Series*, Article 3153078. https://doi.org/10.2139/ssrn.3153078
- Al-Hadi, A., Taylor, G., Hasan, M. M., and Eulaiwi, B. 2023. Third-party auditor liability and financial restatements. *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55 (2), Article 101084. https://doi.org/10.1016/j.bar.2022.101084
- Anantharaman, D., Pittman, J. A., and Wans, N. 2016. State liability regime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ditor reporting. *The Accounting Review*, 91 (6): 1545-1575. https://doi.org/10.2308/accr-51426

- Aobdia, D., Lin, C., and Petacchi, R. 2015. Capital market consequences of audit partner qual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90 (6): 2143-2176. <https://doi.org/10.2308/accr-51054>
- Berglund, N. R., Herrmann, D. R., and Lawson, B. P. 2018. Managerial ability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going concern opinion. *Accounting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18 (1): 29-52. <https://doi.org/10.2308/apin-52125>
- Blay, A. D., and Geiger, M. A. 2013. Auditor fees and auditor in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going concern reporting decision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0 (2): 579-606. <https://doi.org/10.1111/j.1911-3846.2012.01166.x>
- Boone, J. P., Khurana, I. K., and Raman, K. K. 2011. Litigation risk and abnormal accrual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30 (2): 231-256. <https://doi.org/10.2308/ajpt-50003>
- Cahan, S. F., and Zhang, W. 2006. After Enron: Auditor conservatism and ex-Andersen clients. *The Accounting Review*, 81 (1): 49-82. <https://doi.org/10.2308/accr.2006.81.1.49>
- Callaghan, J., Parkash, M., and Singhal, R. 2009. Going-concern audit opinions and the provision of nonaudit services: Implications for auditor independence of bankrupt firm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8 (1): 153-169. <https://doi.org/10.2308/aud.2009.28.1.153>
- Carcello, J. V., and Neal, T. L. 2000. Audit committee composition and auditor reporting. *The Accounting Review*, 75 (4): 453-467. <https://doi.org/10.2308/accr.2000.75.4.453>
- Carcello, J. V., and Palmrose, Z. V. 1994. Auditor litigation and modified reporting on bankrupt client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2 (3): 1-30. <https://doi.org/10.2307/2491436>
- Carcello, J. V., Vanstraelen, A., and Willenborg, M. 2009.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in audit standards: Going-concern opinions in Belgium. *The Accounting Review*, 84 (5): 1395-1428. <https://doi.org/10.2308/accr.2009.84.5.1395>
- Carey, P., Kortum, S., and Moroney, R. 2012. Auditors' going-concern-modified opinions after 2001: Measuring reporting accuracy. *Accounting & Finance*, 52 (4): 1041-1059. <https://doi.org/10.1111/j.1467-629X.2011.00436.x>
- Carson, E., Fargher, N., Geiger, M., Lennox, C., Raghunandan, K., and Willekens, M. 2013. Auditor reporting on going-concern uncertainty: A research synthesis.

-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32 (1): 353-384. <https://doi.org/10.2308/ajpt-50324>
- Chang, W. C., Chen, Y. S., Chou, L. T. L., and Ko, C. H. 2016. Audit partner disciplinary actions and financial restatements. *Abacus*, 52 (2): 286-318. <https://doi.org/10.1111/abac.12077>
- Chen, K. C. W., and Chen, S. F. 2024. Disclosure of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and auditors' litigation risk.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43 (1): 51-71. <https://doi.org/10.2308/AJPT-2021-057>
- Chi, H. Y., and Chin, C. L. 2011. Firm versus partner measures of auditor industry expertise.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30 (2): 201-229. <https://doi.org/10.2308/ajpt-50004>
- Chi, W., Myers, L. A., Omer, T. C., and Xie, H. 2017. The effects of audit partner pre-client and client-specific experience on audit quality and on perceptions of audit quality.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2: 361-391. <https://doi.org/10.1007/s11142-016-9376-9>
- Chi, W., and Pan, C. K. 2021. Legal liability, audit manpower allocation and audit quality: Evidence from Jap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25 (2): 426-441. <https://doi.org/10.2308/ajpt-50004>
- Chin, C. L., and Chi, H. Y. 2009. Reducing restatements with increased industry expertise.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6 (3): 729-765. <https://doi.org/10.1506/car.26.3.4>
- Choi, J. H., Kim, J. B., Liu, X., and Simunic, D. A. 2008. Audit pricing, legal liability regimes, and Big 4 premiums: Theory and cross-country evidence.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5 (1): 55-99. <https://doi.org/10.1506/car.25.1.2>
- Chung, H., Sonu, C. H., Zang, Y., and Choi, J. H. 2019. Opinion shopping to avoid a going concern audit opinion and subsequent audit quality.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38 (2): 101-123. <https://doi.org/10.2308/ajpt-52154>
- Chy, M., Franco, G. D., and Su, B. 2021. The effect of auditor litigation risk on client access to bank debt: Evidence from a quasi-experiment.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71 (1): 1-26. <https://doi.org/10.1016/j.jacceco.2020.101354>
- DeFond, M. L. 2010. How should the auditors be audited? Comparing the PCAOB inspections with the AICPA peer review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 Economics*, 49 (1-2): 104-108. <https://doi.org/10.1016/j.jacceco.2009.04.003>
- DeFond, M. L., and Francis, J. R. 2005. Audit research after Sarbanes-Oxley.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4 (3): 5-30. <https://doi.org/10.2308/aud.2005.24.s-1.5>
- DeFond, M. L., Raghunandan, K., and Subramanyam, K. R. 2002. Do non-audit service fees impair auditor in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going concern audit opin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0 (4): 1247-1274. <https://doi.org/10.1111/1475-679X.00088>
- DeFond, M. L., and Subramanyam, K. R. 1998. Auditor changes and discretionary accrual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5 (1): 35-67. [https://doi.org/10.1016/S0165-4101\(98\)00018-4](https://doi.org/10.1016/S0165-4101(98)00018-4)
- DeFond, M., and Zhang, J. 2014. A review of archival auditing research.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8 (2): 275-326. <https://doi.org/10.1016/j.jacceco.2014.09.002>
- Dye, R. A. 1993. Auditing standards, legal liability, and auditor weal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 (5): 887-914. <https://doi.org/10.1086/261908>
- Feldmann, D. A., and Read, W. J. 2010. Auditor conservatism after Enron.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9 (1): 267-278. <https://doi.org/10.2308/aud.2010.29.1.267>
- Firth, M., Mo, P. L., and Wong, R. M. 2012. Auditors' organizational form, legal liability, and reporting conservatism: Evidence from China.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9 (1): 57-93. <https://doi.org/10.1111/j.1911-3846.2011.01081.x>
- Francis, J. R. 2011.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ing audit quality.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30 (2): 125-152. <https://doi.org/10.2308/ajpt-50006>
- Francis, J. R., and Krishnan, J. 1999. Accounting accruals and auditor reporting conservatism.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6 (1): 135-165. <https://doi.org/10.1111/j.1911-3846.1999.tb00577.x>
- Francis, J. R., and Michas, P. N. 2013. The contagion effect of low-quality audits. *The Accounting Review*, 88 (2): 521-552. <https://doi.org/10.2308/accr-50322>
- Francis, J. R., and Wang, D. 2008. The joint effect of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Big 4 audits on earnings quality around the world.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5 (1): 157-191. <https://doi.org/10.1506/car.25.1.6>

- Gaver, J. J., Paterson, J. S., and Pacini, C. J. 2012. The influence of auditor state-level legal liability on conservative financial reporting in the property-casualty insurance industry.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31 (3): 95-124. <https://doi.org/10.2308/ajpt-10292>
- Geiger, M. A., Gold, A., and Wallage, P. 2019. *A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auditor reporting on going-concern uncertainty: An update and extension (FAR Working Paper No. 2017A01)*. Netherlands: Foundation for Auditing Research.
- Geiger, M. A., and Raghunandan, K. 2001. Bankruptcies, audit reports, and the reform act.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 (1): 187-195. <https://doi.org/10.2308/aud.2001.20.1.187>
- _____. 2002. Auditor tenure and audit reporting failure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1 (1): 67-78. <https://doi.org/10.2308/aud.2002.21.1.67>
- Geiger, M. A., Raghunandan, K., and Rama, D. V. 2005. Recent change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ankruptcies and prior audit opinion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4 (1): 21-35. <https://doi.org/10.2308/aud.2005.24.1.21>
- Geiger, M. A., and Rama, D. V. 2006. Audit firm size and going-concern reporting accuracy. *Accounting Horizons*, 20 (1): 1-17. <https://doi.org/10.2308/acch.2006.20.1.1>
- Goodwin, J., and Wu, D. 2016.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t partner busyness and audit quality?.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3 (1): 341-377. <https://doi.org/10.1111/1911-3846.12129>
- Habib, A. 2013. A meta-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modified audit opinion decisions.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28 (3): 184-216. <https://doi.org/10.1108/02686901311304349>
- Hardies, K., Vandenhoute, M. L., and Breesch, D. 2018. An analysis of auditors' going-concern reporting accuracy in private firm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32 (4): 117-132. <https://doi.org/10.2308/acch-52297>
- Kadous, K. 2000. The effects of audit quality and consequence severity on juror evaluations of auditor responsibility for plaintiff losses. *The Accounting Review*, 75 (3): 327-341. <https://doi.org/10.2308/accr.2000.75.3.327>
- Kaplan, S. E., and Williams, D. D. 2013. Do going concern audit reports protect auditors from litigation?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approach. *The Accounting Review*, 88 (1): 199-232. <https://doi.org/10.2308/accr-50279>

- Khurana, I. K., and Raman, K. K. 2004. Litigation risk and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credibility of Big 4 versus non-Big 4 audits: Evidence from Anglo-American countries. *The Accounting Review*, 79 (2): 473-495. <https://doi.org/10.2308/accr.2004.79.2.473>
- Knechel, W. R., and Vanstraelen, A. 200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tor tenure and audit quality implied by going concern opinion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6 (1): 113-131. <https://doi.org/10.2308/aud.2007.26.1.113>
- Knechel, W. R., Vanstraelen, A., and Zerni, M. 2015. Does the identity of engagement partners matter? An analysis of audit partner reporting decision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2 (4): 1443-1478. <https://doi.org/10.1111/1911-3846.12113>
- Krishnan, G. V., and Wang, C. 2015.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agerial ability and audit fees and going concern opinion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34 (3): 139-160. <https://doi.org/10.2308/ajpt-50985>
- Lee, H. Y., and Mande, V. 2003. The effect of the 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 on accounting discretion of client managers of Big 6 and non-Big 6 auditor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2 (1): 93-108. <https://doi.org/10.2308/aud.2003.22.1.93>
- Lennox, C. S., and Li, B. 2012. The consequences of protecting audit partners' personal assets from the threat of liabil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4 (2-3): 154-173. <https://doi.org/10.1016/j.jacceco.2012.06.002>
- _____. 2014. Accounting misstatements following lawsuits against audito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7 (1): 58-75. <https://doi.org/10.1016/j.jacceco.2013.10.002>
- _____. 2020. When are audit firms sued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failures and what are the lawsuit outcome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7 (3): 1370-1399. <https://doi.org/10.1111/1911-3846.12571>
- Li, L., Qi, B., Tian, G., and Zhang, G. 2017. The contagion effect of low-quality audits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auditors. *The Accounting Review*, 92 (1): 137-163. <https://doi.org/10.2308/accr-51407>
- Li, L., Qi, B., and Zhang, P. 2024. The impacts of federal judge ideology on auditor litigation risk and auditor behavior.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41 (3): 1608-1638. <https://doi.org/10.1111/1911-3846.12950>

- Liu, Z., and Elayan, F. A. 2015. Litigation risk,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conditional conservatism.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44: 581-608. <https://doi.org/10.1007/s11156-013-0428-y>
- Muzatko, S. R., Johnstone, K. M., Mayhew, B. W., and Rittenberg, L. E. 2004.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IPO underpricing and the change to the LLP organization of audit firm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3 (1): 53-67. <https://doi.org/10.2308/aud.2004.23.1.53>
- Neal, T. L., and Riley, R. R., Jr. 2004. Auditor industry specialist research design.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3 (2): 169-177. <https://doi.org/10.2308/aud.2004.23.2.169>
- Owusu, F., and Lin, K. Z. 2025. Does auditor litigation risk constrai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Research*, 24 (3): 113-141. <https://doi.org/10.2308/JIAR-2023-051>
- Read, W. J., and Yezegel, A. 2016. Auditor tenure and going concern opinions for bankrupt 117 clients: Additional evidence.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35 (1): 163-179. <https://doi.org/10.2308/ajpt-51217>
- Reichelt, K. J., and Wang, D. 2010. National and office-specific measures of auditor industry expertise and effects on audit qual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8 (3): 647-686. <https://doi.org/10.1111/j.1475-679X.2009.00363.x>
- Reynolds, J. K., and Francis, J. R. 2000. Does size matter? The influence of large clients on office-level auditor reporting decis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30 (3): 375-400. [https://doi.org/10.1016/S0165-4101\(01\)00010-6](https://doi.org/10.1016/S0165-4101(01)00010-6)
- Robinson, D. 2008. Auditor independence and auditor-provided tax service: Evidence from going-concern audit opinions prior to bankruptcy filing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7 (2): 31-54. <https://doi.org/10.2308/aud.2008.27.2.31>
- Sanoran, K. L. 2018. Auditors' going concern reporting accuracy during and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 Economics*, 14 (2): 164-178. <https://doi.org/10.1016/j.jcae.2018.05.005>
- Schmidt, J. J. 2009. *Financial statement misstatements, auditor litigation, and subsequent auditor behavior*.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TX.
- Sun, J., and Liu, G. 2011. Client-specific litigation risk and audit quality differentiation.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26 (4): 300-316. <https://doi.org/10.1108/JMAJ-03-2011-0011>

org/10.1108/02686901111124639

- Sundgren, S., and Svanstrom, T. 2014. Auditor-in-charge characteristics and going concern reporting.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1 (2): 531-550. <https://doi.org/10.1111/1911-3846.12035>
- Thoman, L. 1996. Legal damages and auditor effort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3 (1): 275-306. <https://doi.org/10.1111/j.1911-3846.1996.tb00501.x>
- Venkataraman, R., Weber, J. P., and Willenborg, M. 2008. Litigation risk, audit quality, and audit fees: Evidence from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The Accounting Review*, 83 (5): 1315-1345. <https://doi.org/10.2308/accr.2008.83.5.1315>
- Zhang, J. H. 2018. Accounting comparability, audit effort, and audit outcome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35 (1): 245-276. <https://doi.org/10.1111/1911-3846.12381>

附錄 變數定義

變數	定義
<i>GCO</i>	虛擬變數。1，代表公司收到 <i>GCO</i> ，否則為 0。
<i>BEFORE</i>	虛擬變數。1，代表會計師被投保中心起訴之前的受查客戶，否則為 0。
<i>AFTER</i>	虛擬變數。1，代表會計師被投保中心起訴後的受查客戶，否則為 0。
<i>LNLEADAGE</i>	會計師之執業年資，再取自然對數
<i>LEADSPEC</i>	虛擬變數。1，代表會計師為產業專家，否則為 0。產業專家是指會計師的產業別市場占有率大於 $1.2 \times$ 平均產業內會計師人數的倒數 (Reichelt and Wang, 2010)。
<i>LNLEADSIZE</i>	會計師查核的客戶數，再取自然對數。
<i>C_LEAD</i>	客戶總資產除以會計師所有客戶總資產之合計數。
<i>LNLEADTEN</i>	會計師查核的客戶數，再取自然對數。
<i>BIG4</i>	虛擬變數。1，代表四大，否則為 0。
<i>LNARL</i>	查核報告日減資產負債表日後之差額再取自然對數。
<i>SIZE</i>	期末總資產取自然對數。
<i>ROA</i>	繼續營業部門淨利除以平均總資產。
<i>LOSS</i>	虛擬變數。1，代表公司本期淨利為負，否則為 0。
<i>LEV</i>	總負債除以總資產。
<i>GCO_1</i>	虛擬變數。1，代表公司前期收到 <i>GCO</i> ，否則為 0。
<i>LNAGE</i>	公司成立年數取自然對數。
<i>LIST</i>	虛擬變數。1，代表上市、櫃公司，否則為 0。
<i>CASH</i>	公司現金和流動金融資產的合計數再除以總資產。
<i>AFTER_SET</i>	虛擬變數。1，代表採和解策略的會計師被投保中心起訴後的受查客戶，否則為 0。
<i>AFTER_SUI</i>	虛擬變數。1，代表採訴訟策略的會計師被投保中心起訴後的受查客戶，否則為 0。
<i>AFTER_WIN</i>	虛擬變數。1，代表一審法院判決會計師勝訴後的受查客戶，否則為 0。
<i>AFTER_LOS</i>	虛擬變數。1，代表一審法院判決會計師敗訴後的受查客戶，否則為 0。
<i>AFTER_BAN</i>	虛擬變數。1，代表訴訟事件公司破產的被告會計師在被投保中心起訴後的受查客戶，否則為 0。
<i>AFTER_UNB</i>	虛擬變數。1，代表訴訟事件公司未破產的被告會計師在被投保中心起訴後的受查客戶，否則為 0。
<i>FBEFORE</i>	虛擬變數。1，代表會計師事務所被投保中心第一次起訴前的受查客戶，否則為 0。
<i>FAFTER</i>	虛擬變數。1，代表會計師事務所被投保中心第一次起訴後的受查客戶，否則為 0。

Author Biography

*Wen-Ching Chang

Wen-Ching Chang received her Ph.D. in Accounting fro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currently serves a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at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auditing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Her research has appeared in the publications such as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Abacus*,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Chinese), *Sun Yat-Sen Management Review* (in Chines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view* (in Chinese), *Taiwan Accounting Review* (in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in Chinese), *NTU Management Review* (in Chinese), *Review of Securities and Futures Markets* (in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Systems* (in Chinese), and *Management Review* (in Chinese).

*E-mail: wchang@cc.ncue.edu.tw

The author gratefully acknowledges th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associate editor and the two anonymous referees. I am also grateful for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STC 112-2410-H-018-036].

作者由衷感謝領域主編與兩位匿名評審委員惠賜寶貴意見，使本論文更臻嚴謹及完善。本研究承蒙國科會經費補助（編號：NSTC 112-2410-H-018-036），特此致謝。

Does Litigation Experience Improve Audit Partners' Audit Quality?